

黄河治理的历史谱系映射着中华文明演进的空间实践逻辑，其水患调控机制重构了流域生态格局，蕴含着前工业化时代应对环境危机的认知范式与制度调适机制。从大禹治水的神话原型，到明清束水攻沙的技术革新，治黄工程始终在刚性防御（如夯土堤防体系）与弹性疏导（如贾让三策中的分流理论）间寻求动态平衡。这种辩证治理思维，在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导流沟槽与潘季驯“蓄清刷黄”工程中均得到物质印证。在社会组织层面，治水活动催化了跨血缘的地域联盟（如汉代“河平碑”记载的十三县协作）；官僚体系通过河工徭役制度，将分散的民间力量纳入国家动员网络。这种垂直整合与水平协作的双轨模式，在清代河督衙门的档案文书中呈现清晰的权责分配图谱。且者，流域居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适应性策略，展现出农耕文明在风险管控与资源利用中的弹性智慧。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生产逻辑，至今仍在豫东故道区的地貌肌理中留有可辨识的文化印记。

一、古代治黄实践孕育系统治水策略

古代黄河治理实践揭示了系统治水策略的三维耦合特征：在空间维度上，通过“堵疏并行”技术构建弹性防洪体系，如主堤—遥堤双重架构既能约束洪峰走向，又能依托自然地势设置分洪闸堰引导洪水缓释；在时间维度上，采用埝工等柔性技术对河岸进行动态加固，其秸秆与黏土混合结构既适应河床变迁，又可形成代际传承的工程韧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系统策略并非静态设计，而是融合了动态调整机制：治河官员通过周期性“巡河察淤”评估淤积程度，调节疏浚频次，并创新性地将滞洪区功能与农业生产周期相耦合，在汛期蓄洪与非汛期农耕的弹性切换间展现了土地利用的时空智慧。特别具有启示性的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策略，其巧妙利用水流动力实现了河道自维护。这种将自然力转化为工程助力的思维，本质上是对河流动力学与人工干预阈值的精准把握。当前智能治水体系的发展，可借鉴这种多维协同理念，通过可调节闸坝与实时监测系统的模块化嵌入，构建兼顾灾害防御与生态适应的新型治水范式。

二、社会组织强化流域协同治理效能

黄河流域的协同治理传统，根植于传统社会对“跨域公共性”问题的制度回应。古代官僚体系设立专职水务机构（如清代河道总督），负责统筹流域内行政单元的权责分配，并制订统一的工程标准与劳役征调制度，用于化解地方治理中的“搭便车”困境。这种垂直管理体系与横向协作网络的结合，体现为“以工代赈”模式：官府组织灾民参与堤防修缮，在保障劳动力供给的同时，通过粮食配给维系了社会稳定。此外，古代治黄将水利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迫使执政者超越任期限制谋划长远工程。这种激励机制的设计，为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提供了组织保障。

民间社会力量的动员则是协同治理的另一支柱。宗族组织通过制定“水约”规范灌溉秩序，利用族田收入维系沟渠维护；商帮集团依托漕运利益共同体，资助险工段抢险物资储备。这种“官督民办”模式的关键在于构建多元主体间的信任纽带与利益共享机制。例如，明清时期“河工捐输”制度允许士绅以捐资换取社会声誉，并要求官府通过勒石铭功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形成非正式治理资源向正式体系的转化通道。当代流域治理可借鉴该类经验，建立政府、企业、社区间的协商平台，通过生态补偿协议、联合巡查制度等，将碎片化治理诉求整合为共同行动纲领，有效激活社会资本的协同潜力。

三、生态智慧平衡防洪与灌溉需求

传统治黄中的生态智慧，集中表现为对自然系统的模仿与调控。在防洪领域，古代治河者通过“就地取材”策略，利用柳树捆扎制成埝堤、栽种防浪林固滩，既控制了水土流失，又以生物措施增强了堤岸韧性；在灌溉领域，依托“鼓塘串联”系统将汛期洪水蓄存于人工湖泽，并在旱季通过闸门调控反哺农田。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水资源配置逻辑，实质是对水文周期的精细化利用。更深层次的策略在于，将治水与土地改良结合。例如，在盐碱地开挖排水沟渠，引黄淤灌后形成“上粮下淤”的土层结构，使防洪排涝与土壤改良形成正向循环。

从历史视角审视，生态平衡还需依托适应性管理技术。古代设置的“四防二守”制度（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官守、民守），实现了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的无缝衔接，同时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制定了“分时用水”规则，如春灌优先保障小麦、秋汛集中疏浚河道等。这种“因时施策”的管理智慧，要求当代治黄在数字技术支撑下，构建弹性调度模型。例如，利用遥感监测预判泥沙淤积趋势，动态调整水库泄流量；通过智能配水系统，依据土壤墒情与降水预报优化灌溉时序，使水资源分配既遵循自然节律，又响应突发扰动。这种基于历史经验的适应性创新，或将成为破解现代治黄多重目标冲突的重要路径。

四、结语

回望黄河治理历史脉络，其经验沉淀着中华文明对生态规律的敬畏与适应。古代治水技术以系统性思维突破工程局限；社会组织机制以协作网络激活治理效能；生态智慧则以可持续理念调和生存需求。三者共同构成了黄河治理经验的“文明基因库”。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语境下，这种历史视角的再审视，既是对传统治水逻辑的继承与扬弃，又是现代技术审问思维的纠偏。其彰显了治黄是水利工程的技术迭代，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重构。从历史中提炼出的协同治理范式与动态平衡智慧，或将成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局，实现人水和谐共生的关键密钥，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贡献东方文明的制度创新与价值参照。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师资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五帝时代到夏代王权与国家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2VLS003）的阶段性成果】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基本路径

◎ 李转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需在多重张力场域中寻求统一，以推进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语境下的话语权博弈实践。当前该话语体系面临双重困境：从内部维度观之，需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与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之间的理论断裂带，通过提炼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智慧形成具有解释效力的概念谱系；就外部维度而言，既要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预设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认知框架，又要构建能够承载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跨文化阐释机制。其建构路径应遵循“三维互动”逻辑：在理论层面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互嵌，在实践层面形成可量化的制度创新案例数据库，在传播层面运用数字技术重构多模态叙事矩阵，从而形成兼具文明对话功能与实践指导价值的现代化话语生态系统。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深度互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融合建构，呈现为双重历史逻辑的融合：既需完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本土化转译（如将“剩余价值规律”置于“义利之辨”的

伦理框架中重释），又要对传统治理资源进行唯物史观视角的现代化提纯（典型案例体现在“郡县制”与当代央地关系的对话性重构）。这一互嵌过程在认识论层面展现出独特的辩证张力：当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性”原则遭遇《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老命题时，两者并非简单的概念叠加，而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实践（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耕者有其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范式。此外，这种融合必须规避两种方法论陷阱：其一是将“民本思想”机械对应为“群众史观”的比附式阐释（如忽略传统民本与现代民主的本质差异），其二是陷入“体用之争”的二元对立思维（典型表现为对“礼法合治”制度的过度理想化想象）。

二、以现代化实践叙事重塑话语逻辑并提炼典型案例强化本土解释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需突破“实践—理论”的转化壁垒，将本土实践转化为具备全球解释力的叙事体系。从方法论维度审视，脱贫攻坚中形成的“滴灌式扶贫”精准施策机制，科技攻关领域以“两弹一星”模式为

蓝本演进的“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模式”，以及浙江“千万工程”展现的“迭代升级式城乡治理”路径，均是具有范式突破价值的叙事素材。以“千万工程”为例，其历时二十年的渐进式改革塑造了“绿水青山”生态治理范式，开创了“党政主导—市场激活—村民主体”的三元互动机制，这种融合政策延续性与实践创新性的特质，使其成功纳入联合国人居署《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案例库》，形成对西方现代化线性发展观的解构性对话。此类实践智慧的文本转化需构建多维叙事矩阵：在学理层面，可借鉴“制度弹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阐释政策试验与制度定型间的辩证关系；在传播层面，应整合《摆脱贫困》等纪实文学的故事化表述与《大国重器》等影视作品符号化呈现，形成具象化的话语转译通道，从而建构既植根本土经验又具备跨文化传播效能的现代化叙事体系。

三、构建多语种国际传播机制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话语霸权

国际传播体系的现代化转型需突破传统“被动辩解”范式，转向基于主体间性的话语场域重构，构建“文明对话”导向的多维动

态传播机制。具体而言，首先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所构建的跨区域合作框架，搭建具有文明包容性的多边对话平台（如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通过《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工程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等核心概念进行语义拓扑学层面的译介重构，实现政治话语的精准跨文化转换。其次在传播载体层面，应构建TikTok、CGTN等新媒体矩阵的协同传播网络，运用“国潮出海”的文化符号再生产策略与“乡村Vlog”的微观叙事模式，在算法推荐机制中嵌入“柔性政治传播”的编码逻辑，以此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叙事的单维阐释。同时，国际汉学界的“概念再诠释”工程（如将“仁政”与全球治理的“善治”范式进行知识考古学勾连），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文件体系中的制度化嵌入，共同构成话语合法性的双重支撑体系。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5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研究（2025YB009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史关键场景，通过神经可塑性机制激活深层次学习记忆。大数据监测体系创新性地整合了复杂网络分析与教育干预的时效性原则，利用社会计算框架解构学生思想演变的多维谱系，形成基于注意力曲线的动态决策模型。区块链技术的引入构建了符合信任机制设计的分布式存证架构，还通过博弈论中的激励相容原理，将智能合约机制与教育评价体系有机耦合，实现了从学分认证到荣誉激励的全流程可追溯流转，从而在降低教育过程的信息熵值的同时，重塑了价值传递的可信度空间。

四、结语

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有机融合呈现多维度的演进特征。这种系统性变革通过建立跨学科协作架构、打造数字化育人空间、实施动态化课程改革，促使传统思政教育范式发生结构性转变：从单向度的理论传输转向多模态的价值渗透，重构了知识生产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交互机制。该实践创新既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治党治理念的具象化实践路径，也彰显出在全球化语境下抵御文化渗透的前瞻性战略部署。未来，高校应着重提升两者间的战略协同度，将革命文化基因编码进人才培育的全周期链条，塑造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教育生态系统，使高校成为解码时代命题的思想实验室和创新型人才的孵化器，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治理范式。（作者系保山学院副教授）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 杨亚敏

在历史方位视阈下，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跃迁期，呈现社会主要矛盾结构性嬗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式转型的双重特征。这种双重变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时空叠加效应中，催生出高等教育场域中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时代新人的现实诉求。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神经中枢，其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创新不仅涉及解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还通过组织化学习机制重构实现政治认同与价值内化的过程性耦合。该研究基于多维架构视角，聚焦理念融合、空间再造、方法革新三个向度，探索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人才成长规律的场域融合机制。

一、构建党建引领与思政教育协同机制

新时代高校应基于系统性思维推进党建与思政教育的深度互构，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两者的有机耦合。首先需构建党委主导的“双融双促”立体化架构，确立党组织在育人实践中的中枢作用，将政治建设目标与思政教育指标纳入统一的制度矩阵。这种融合可通过制定《党建思政融合实施纲要》具象化，其创新性体现在组织设置革新，如在教研室、学生社团等教学单元设立党支部，促使党建触角延伸至学术前沿与学生社群。同时实施的“双向任职”制度打破学科壁垒，选拔兼具理论素养与教育能力的思政课教师担任党支部书记，组建由专业党务工作者参与的课程思政智囊团，形成“党建专家化”与

“教育政治化”的双向赋能格局。为保障机制长效运行，高校可建立包含过程监测与效果评估的动态反馈系统，将融合成效量化指标嵌入高校综合考评体系，通过校院两级党组织生活会与教学督导联席会议构建常态化诊断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政策工具实施效度进行多维分析，推进顶层设计与末端落实的同频共振。

在资源整合维度，高校可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党校为主体创建跨学科理论创新联合体，其运作模式体现为三个层面的突破：在知识生产层面开发模块化课程体系，如将百年党史解构为“理论溯源—实践验证—价值传承”的三维叙事单元，采用双师同堂制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转译；在实践创新层面搭建“党建+”项目孵化器，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红色研学旅行课程设计、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等创新实践，构建“理论学习—社会实践—价值内化”的闭环培养体系；在评价机制层面建立多维度的质量评估模型，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课程思政成效进行度效检验，通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淘汰低效实践模式，最终形成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育人生态系统。这种协同机制将突破传统思政教育的线性传播范式，通过制度重构与资源重组打造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的育人共同体。

二、整合课程资源与实践活动共享平台

高校亟须重构跨学科协同育人范式，

突破院系壁垒与学科藩篱，着力打造课程思政资源聚合体。该生态系统应采取分层耦合架构：底层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核心课程集群，运用话语解构技术提炼政党学说中的价值内核，开发“新时代党建思想体系解码”等模块化识读课程；中层推进“课程思政基因图谱”建设工程，促使教师开展双轴教学设计，如在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中植入力学森系统思维中的党性维度，于供应链管理教学中解析基层党组织的市场治理效能；顶层搭建基于分布式账本的资源共享网络，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引擎实现思政素材的跨模态关联检索。为保障内容迭代效率，高校应构建自适应更新机制，运用爬虫技术实时监测政策文本与学术动态，生成智能教学组件库，并通过混合式教研共同体促进理论研究成果向教学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三、创新数字化赋能融合教育模式

数字化转型可重构技术架构范式，为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融合开辟教育神经科学与计算社会科学的交叉路径。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沉浸式学习框架下，高校可构建集成多模态交互接口、实时情感分析引擎和分布式学习节点的“智慧党建思政一体化平台”，其核心模块包含采用迁移学习增强的情境感知型AI党建助手，该系统通过融合教育心理学中的认知负荷理论，运用个性化推荐算法实现动态知识图谱的精准推送。虚拟仿真实验室则依托扩展现实（XR）技术复原党

基于体育强国视阈下的体育类院校教学改革路径探究

◎ 吕冬伟

运动健康等模块，使高校体育教学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同时，高校还要注意优化体育教学的评价机制。高校传统的单一考核方式已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体育素养，为此新的教学评价体系要引入多维评价标准，可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综合学生参与度、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等多方面表现，形成更具科学性的评估体系，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有力依据。

二、促进学科融合，提升体育教学效能

当前，单一学科的体育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对综合型体育人才的需求，因而体育教学改革要加强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实现体育知识的跨界应用与拓展。高校应主动联合体育产业、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组建高水平的教师团队，教师团队成员要不定期深入体育俱乐部、运动康复中心、竞技训练基地等场所，系统梳理运动技能培养、身体素质提升、心理调适等方面的核心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新以多学科知识融合为核心的教学模块。例如，以大学运动心理学课程为例，该课程将心理学和体育学融合在一起，将学生分配到不同运动项目进行实际操作，学生通过参与特定项目的技能学习过程，深刻认识到心理因素对运动表现的影响，掌握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技巧，这样多学科的教学课程既促进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升，也培养了他们在未来生活和职业中保持积极心态和应对挑战

的能力。此外，加强体育与科技的协同创新，在课程中引入智能化设备和数据分析技术，例如可穿戴设备、运动传感器等，实时监测学生的运动表现，并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同时，学校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引入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训练场景，让学生在“真切”的场景中进行训练，以提升学生的运动兴趣，培养他们对真实比赛环境的适应能力，带领学生切实地体悟理解体育内核。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育高水平体育人才

体育强国建设需要高水平的体育人才作为支撑，为此高校应立足于时代发展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输送更多兼具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体育精英。高校可与体育行业龙头企业、职业俱乐部、体育赛事运营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在人才培养中的职责分工。企业选派优秀的职业教练、体育管理人员作为导师，指导学生在真实的体育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践训练，学校则由体育专业教师提供理论教学支持。例如，在竞技体育方向，学校可安排学生在合作俱乐部跟随教练进行专项训练和赛事模拟，促使其在实践中掌握技战术运用、运动员管理等专业技能。与此同时，学校定期开设体育心理学、运动训练学等课程，帮助学生深化理论认识。

“1+X”证书制度融合同样是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高校可以根据体育行

业不同职业岗位的需求，选择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如社会体育指导员证、运动康复师资格证、体育赛事运营师证等，并将证书考核内容融入课程体系，构建学历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在社会体育专业中，学校可在《健身指导与实践》《运动生理学》等课程中融入社会体育指导员证考试的核心知识点，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健身指导技能，加强与教练员资格证相关的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也能获得直接就业的能力。学校还可组织专题培训、模拟考试、行业讲座等，帮助学生熟悉考试内容，提高职业证书考取率，为学生未来进入体育行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学校还要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在教学中引入跨学科研究项目，鼓励学生探索体育与人工智能、社会学等领域的结合点，通过开放性的课题研究，引导学生提出新思路，创造新成果，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活力。

总的来说，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在增强国民体质、培养竞技人才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体育教育自身的完善，也是对社会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在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下，未来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以更科学的教学设计、系统的资源整合和创新的培养方式，实现全民健康、体育事业腾飞的伟大目标。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副教授）